

現代中国語助動詞意味研究の現状及び問題点

—現代中国語助動詞意味研究の方法を兼ねて—

魯 曉 琨*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its semantics of the auxiliary verbs. In spite of the current needs to face and deal with its difficulty.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employ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its researchers. For this reason, I have presented several papers on this very subject in the past.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former studies,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bserved in them. In short, my suggestions here are to clarify the methods and define the direction of the studies of semantics.

Key Words: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Linguistics theory, Longitudinal study, Crossing study

和文要旨

筆者はここ数年基本的な助動詞に関する意味的研究を進めており、願望を表す助動詞の意味及び意味の面における対照研究についての論文を発表し、可能性を表す助動詞についても考察を深めている。研究の過程において筆者は助動詞の意味は中国語の初級教学における難点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研究はいまだに充分になされているとは言えず、すでに発表されたいくつかの論文は研究方法と内容面において限界があることを認識した。この点をふまえて拙稿では助動詞の意味的研究の現状、特に存在する問題に対して総括を加え、またこうした観点に基づき助動詞の意味研究の課題と方法を明確にするものである。

The problems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auxiliary verbs

* Lu Xiaokun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nkyo Women's University, 1196 Kamckubo , Oimachi, Iruma-gun, Saitama 356-8533, Japan.

Accepted October 19, 1999.

Published December 20, 1999.

现代汉语助动词，又叫能愿动词。助动词是依据这类词的功能命名的，能愿动词是依据这类词的意义命名的。由于按照功能标准给词分类在汉语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再加上这类词的意义比较复杂，用“能愿”并不能完全概括这类词的意义，所以本文采用“助动词”这一名称。在这里我们把助动词分为三类：表示意愿的，如：想，要，愿意，肯；表示可能的，如：能，会，可以；表示该当的，如：应该，该，必须。这里举出的助动词都是该类中最基础的，最有代表性的。

笔者近来正在对这些基础助动词的语义进行研究，关于意愿助动词的语义及语义对比研究已成文发表⁽¹⁾，对可能助动词也作了诸多思考。在进行助动词的语义和语义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推动汉语助动词语义研究，也为笔者关于助动词语义的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就决定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

本文在对助动词语义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试图明确助动词语义研究的课题，找到助动词语义的研究方法。

一 助动词语义研究是汉语语义研究的薄弱环节

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语法研究还只停留在词法，句法结构的研究上，很少涉及意义，一说意义就进入了词汇研究的范畴，一般是指词义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汉语助动词语义研究纯属空白。

80年代由于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的导入，汉语语法研究从纯形式的研究转向结合意义的研究。句法的深层语义研究，语义指向研究和一些副词的语义研究等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助动词的语义研究仍微乎其微。胡裕树，范晓（1994）《助动词研究综述》一文概括总结了助动词的研究成果，其中分五个部分：名称，归类，划界，功能，方法和范围。完全没有提到助动词的意义研究。这说明80年代以至90年代初助动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称，归类，划界，功能，方法和范围等问题上。当然也有几篇论文发表，如：张维耿（1982）《助动词“想”和“要”的区别》；蒋平（1983）《“要”与“想”及其复合形式、连用现象》；周小兵（1989）《“会”和“能”及其在句中的换用》。从质量上看仅有的两二篇论文还相当肤浅，基本上限于从助动词的组合特征上看近义词的区别。

90年代以来由于功能语言理论的深入和认知语言学的导入，汉语的语义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语义研究在很多领域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随着汉语语义研究的不断展开，汉语助动词的语义研究也开始得到了重视，这方面的论文明显增多。这些论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探讨近义词组合特征上的区别。有：郭志良（1991）《表示存在可能性的“能”和“可以”》，陶炼（1993）《现代汉语助动词对比研究》，陶炼（1997）《表示“或然性”的助动词“可能”“会”“能”之差异研究》，熊文（1999）《论助动词的解释成分》。另一种是从意义上

或形式和意义结合来探讨近义助动词的区别。如傅雨贤,周小兵(1991)《口语中的助动词》,许和平(1992)《试论“会”的语义与句法特征》。这方面的研究倒是日本较多。如:史有为(1994)《得说“不能来上课了”》,讀井 唯允(1996)「助動詞(能,会,可以)」,鲁晓琨(1997)《能愿动词“要”的语义探讨》,渡边丽玲(1998)《助动词“能”与“会”的句法语义分析》,渡边丽玲(1999)《助动词“可以”与“能”的用法比较分析》,鲁晓琨(1999)《现代汉语意愿助动词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相原茂(1997)『謎解き中国語文法』一书的第一章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可能助动词“会”,“能”,“可以”的意义并进行了语义对比。此外还有汉英对比的,如:熊文(1996)《汉语“能”类助动词和英语can类情态动词的对比》。

从论文数量上看,90年代后明显增加,研究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从助动词组合特征的研究转向了语义特征的研究。从质量上看也有所提高,其中有一些很好的见解,本文不准备对上述论文一一加以介绍,而是把重点放到存在的问题上,具体将在下文谈及。总之,助动词意义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仍属语义研究的薄弱环节。

二 助动词语义研究的必要性

汉语助动词语义研究和其它方面的研究相比,还相当薄弱,这是不是因为助动词语义研究缺少必要性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在对外国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基础阶段,具体地说在日本大学第二外语的第一年,上文提到的基础助动词就已出现,而这些助动词又恰恰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对日本学生来说,助动词的语义是一个使他们感到头疼的问题。铃木(1999)对日本大学经济学部一二年级两个年度考试结果进行了分析,该文3·3通过学生的误答情况发现了学生学习的难点在:疑问句,助动词(原文:能愿动词),补语。可见对基础阶段的汉语学习来说,助动词是难度最大的语法内容之一。该文关于助动词的难度具体谈到三点:1.怎样从很多助动词中选择合适的?2.“不能”什么时候表示禁止,什么时候表示可能?3.“能”和“会”的区别。该文限于试题范围指出的具体难点,可以作为助动词学习难点的例证。

助动词语义对日本学生来说之所以难,首先是由它和学生母语的转换关系决定的。当母语向外语转换时,母语的不同构成部分其转换模式也不同,不同的转换模式又决定其难易度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道科威尔(Stockwell)曾归纳出一个“句法系统困难模式”,后来,布拉图(Clifford Pralor,1967)对斯道科威尔(Stockwell)的“句法系统困难模式”加以简化,得出了下列“困难层次模式”⁽²⁾:

级别	特 质	困难程度
零级	正迁移 (transfer)	0
一级	合并 (coalescence)	逐
二级	差异不足 (under differentiation)	渐
三级	再解释 (reinterpretation)	加
四级	超差异 (overdifferentiation)	深
五级	分裂 (split)	顶点

这个困难模式的第一个层次是非困难层，即母语和所学外语完全对应，学习者完全可以用母语理解外语，所以叫正迁移。从第二层次第一级开始进入难度层，越往下难度越大，第六层次第五级难度最大。

第一级和第五级正好相反，第一级从母语到外语是合成，也就是从多到一。如：日语表示处所时分别使用三个格助词「て，に，を」，译成汉语时都是介词“在”；再如：日语中表示转折关系的表现有很多，译成汉语只有两三种形式。这一级难度最小。第五级和第一级相反，从母语到外语是分裂。汉语助动词对日本学生来说，属于第六层次第五级。例如：日语中一个「できる」译成汉语就可分裂成三个助动词“能，会，可以”；日语中「…したい (…しようと思う)」译成汉语也至少可以分裂成三个助动词“想，要，愿意”，有时还可以把“肯”加进去。这种母语和目的语之间一对多的情况就属于布拉图的“困难层次模式”中最难的一个层次。⁽³⁾正如史有为 (1994) 所指出的“合易分难”。

其次，汉语一些助动词属于多义词，译成日语自然有多种形式，多义助动词内部语义联系和切分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此外助动词内部还存在着肯否不对称的现象，这也使学生感到困惑。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助动词语义问题是日本学生以及其它外国学生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说明了汉语助动词语义研究的必要性。

三 既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第二部分所谈，汉语助动词无论对日本学生，还是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都属于第六层次第五级。被分裂出来的汉语助动词的语义辨析就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所以近年来助动词语义研究的论文，大体上集中在这方面。观察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把助动词语义研究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 在研究近义助动词的区别时，多注意组合特征上的区别，不去深追其后的意义动因。由于受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一部分研究近义助动词区别的论文主要从助动词在句中的

组合情况去寻找它们在形式上的区别，而不去进一步思考其后的意义动因。因此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至少我们发现了下列问题：

I 只看形式不考虑意义就出现了把意义区别误作形式区别的情况

周（1989）在“肯定式的陈述句很少可以用‘能4’”（能4表示有某种可能性）这一结论下，举出了下面的例句：

街坊四邻的都会有意见。（苏叔阳《丹心谱》）

(*街坊四邻的都能有意见。)

他恨你，他会害你的。（曹禺《雷雨》）

(*他恨你，他能害你的。)

说“肯定式的陈述句很少可以用‘能4’”，并不等于肯定句都不能用‘能4’，上述“会”不能用“能”替换，完全是由于意义上的原因。许和平（1992）、讚井（1996）、相原（1997）都曾指出了“能”和“会”在意义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即被推测的情况如果是不如意的，或者说不能期待的情况时，只能用“会”，不能用“能”。如：

不注意身体，你就会/*能生病的。

他听了一定会/*能生气的。

周（1989）中不能用“能”的例句，如果换成某种期待的情况，就可以用“能”了。

街坊四邻的都能赞成。

他喜欢你，他能帮助你。

II 只观察形式不考虑意义，就出现了被一两个用例的形式特征所迷惑的情况

周（1989）否定句中的会2（表示某种情况或某种性质有现实的可能性）有时不能换成能4。其中一种情况是动词后面有补语。

他不会来得那么巧。

*他不能来得那么巧。

其实不然，把“巧”换成“早”就可以用“能”了。

他不会来得那么早。

他不能来得那么早。

显然不是形式的区别，而是由意义的不同造成的，用“早”就是“能”所可以接受的意义，用“巧”就超出了“能”可以接受的范围。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中探讨。

III 只讲形式不追究意义，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式出现，学习者只能机械记忆，当我们从意义上给予解释后，形式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

陶（1997）在谈“能”和“会”的区别时，在形式上发现这样一点：“‘会’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可以是否定形式，‘能’只有在表示反问时才能用否定形式的动词或形容词。”如：

这道命令发布下去，一定会有人抵制，一定会有人不高兴。

喝那么多咖啡，你会睡不着的。

陶文中的两例“会”后都是不期待的情况，所以容易被认为不是否定形式的问题，其实也可以有表示期待情况的否定形式出现。

民主实现了，大家就会不再游行了。

妈妈走了，孩子反而会不闹了。

这种形式上的表现完全是由意义决定的。我们发现各家虽然给“能”列出了多个义项，其实所有的义项都可以概括为一点：“能”表示S具备了实现VP的条件。那么“能”所要求的预设“VP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实现的只能是肯定式，不可能是否定式。这样从意义上分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 只局限于对比，忽略了单个助动词内部的语义研究

关于单个助动词的意义我们能参考的是《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语法书，近来的研究论文中，相原（1997）对“会”，“能”，“可以”内部语义作了系统的分析。此外，傅，周（1991）研究了单个助动词的意义，但也只是泛泛而谈。其实现有语法书上对助动词的语义解释还远远不够。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I 有些助动词虽被列出多个义项，仍有被遗漏的语言现象

《八百词》把“要”分为五个义项：

1. 表示做某事的意志。
2. 须要、应该。
3. 表示可能。
4. 将要。
5. 表示估计，用于比较句。

《八百词》虽然把“要”归纳为五个义项，但仍然有两种语言现象没有接触到。

明天我们学校要检查卫生。

朱德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香山公园。

这说明在进行助动词语义研究时，不能局限于语法书中现有的语言材料，还要做大量的资料工作，全盘掌握一个助动词的所有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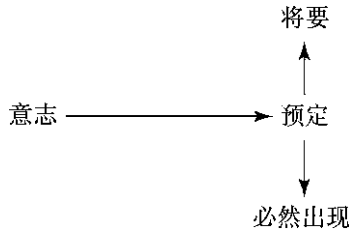
II 只注意各个义项之间的区别，不注意不同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

笔者（1997）关于“要”的语义研究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文中只注意“要”的不同义项之间的区别，没有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近来笔者用认知语言理论来考虑，发现“要”属于原型概念，其原型意义表示意愿，其它意义都是从这一原型意义派生出来的。如：

我要去中国，可是妈妈反对。 （意志）

- 我要去中国，你有事吗？（预定）
我要去中国了，这件事你找别人吧。（将要）
我每年都要去中国一两次。（必然出现）

以上四句动作主体都是第一人称，动词都是自主动词“去”，因语境不同，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都是从意志一义派生出来的，构成一个连续统。可以简单用下图表示：



意志进一步发展就到了预定阶段。当一种新预定出现时，就意味着一种原有的状态将向新状态转化，所以句末加上表示变化的语气助词“了”，就产生了将要的意义；在另一方“预定”又派生出另一个意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有一种反复出现的预定，“要”就进而表示必然出现的情况。

除此之外，“要”还有几种意义，这些意义也都可以处在一个连续统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关于“要”的原型意义和隐喻以后还有专文探讨。

象这样搞清义项之间的联系，就能在联系中看区别，而且对每个相接部分出现的暧昧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

III 只注意划分义项，不注意找出统帅整个义项的核心意义

由于不同助动词的意义构成不同，有的助动词属于原型意义，有的并不属于原型意义，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能够贯彻到底的中心意义。

如，一般语法书上“能”的意义列出几种，但是我们觉得不管哪种意义都可以概括为：“能”表示S具备了实现VP的条件。

如：他能说汉语。

他能来。

这儿能抽烟。

这种机器能织布。

这些被归为不同义项的例句都可以作同样的解释，不同点在怎样具备上，笔者将有专文论述，在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四 研究课题及研究方法

(一) 研究课题

鉴于日本学生以及其它外国学生学习的难点, 以及现在助动词语义研究的局限, 笔者主张应该从纵横两向上展开对助动词语义的研究。所谓纵向研究就是研究多义助动词内部的语义联系和区别; 所谓横向研究就是对近义助动词进行对比研究。

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缺一不可, 而且是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纵向研究是横向研究的前提。不弄清多义助动词语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就无法限定横向对比的范围。如:

我要回国, 不知老师给不给我假。

我要回国, 你有事吗?

由于后文的不同, “我要回国”中的“要”意义并不相同, 前一句中“要”表示意愿; 后一句中的要表示预定。虽然预定是从意愿发展来的, 但在观察“要”和“想”区别时, 二者有明显的不同。表示预定的“要”不和“想”发生交叉关系, 表示意愿的“要”和“想”发生交叉关系。所以笔者对“要”和“想”进行对比时, 首先排除了“要”的预定义, 仅就“要”的意愿义和“想”对比, 这样才能抓住要点, 得出正确的结论。

反过来横向研究也可以促进纵向研究。笔者(1999)在对近义意愿助动词“想、要、愿意、肯”进行语义研究时, 恰恰是通过“想”和“要”、“想”和“愿意”、“愿意”和“肯”的对比找到了各自的语义特征。这里不再赘述。

(二) 研究方法

助动词的语义是十分复杂的, 仅靠一种语言理论是难以解决助动词意义方面的问题的, 因此笔者主张拿来主义, 即借用各种语言理论来解决助动词的语义问题。袁毓林(1999, p100)在“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研究”一节的结尾处, 列出了该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背景的对照图, 并指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面对汉语中一些比较复杂的语言现象, 我们必须在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的语法描写方法作并行的处理, 才有可能发现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笔者(1999)在意愿助动词语义研究中, 也作了同样的尝试, 运用了多种语言理论,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语言理论也可以为其它助动词的语义研究打开通路。下面结合笔者(1999)谈谈几种语言理论在助动词语义研究中的运用。

1 运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从组合特征上发现助动词的意义倾向

结构主义语法研究着重研究句法结构的组合关系, 不关心意义。如果象前文指出的那样, 仅观察形式, 罗列组合特征的不同, 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是观察形式仍是我们研究意义的第一步, 或者说是突破口, 因为任何形式背后都是意义作用的结果, 我们可以透过

形式去发现语义倾向。刘宁生(1985)就动词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曾指出“动词的组合特征就是动词意义的外在表现,或者叫句法表现。把组合特征孤立地看成语法现象,与语义相隔离是不妥当的。”⁽⁴⁾助动词当然也不例外。

如,意愿助动词“想”,“要”,“愿意”,“肯”在组合特征上有这样的特点,“想”,“愿意”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要”,“肯”不接受程度副词修饰。因为静态形容词,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动态形容词,动词不受程度副词修饰,我们就可以发现“想”,“愿意”有静态性,“要”,“肯”有动态性。这就为进一步具体思考二者的意义区别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陶炼(1997)在谈“能”和“会”的区别时,从句法搭配上找到了下面的不同。“在否定句中‘决’,‘绝对’只能用在‘会’的前面,‘远远’,‘迟迟’等只能用在‘能’的前面”如:

那人细密得出名,决不会有疏漏,更不会有这么干。

粮食生产发展缓慢,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决’,‘绝对’强调主观判断,‘远远’,‘迟迟’说明客观距离速度,“会”可以与‘决’,‘绝对’组合,也说明“会”具有主观性;“能”可以与‘远远’,‘迟迟’组合,也说明“能”具有客观性。

II 运用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在句群以至篇章中考察助动词的意义

结构主义研究只停留在句子单位上,从句子的组合关系上来观察意义。所以采取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只能发现助动词的语义倾向,不能真正解决语义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更大的语言环境一句群以及篇章中来观察助动词的语义和语义区别。如:

我想去中国留学。

我要去中国留学。

我愿意去中国留学。

我肯去中国留学。

上面四句都成立,仅从句子观察,我们不会发现四者的区别,要想发现四者的区别,就要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语言环境中来观察。如:我们在下面的对话中观察“想”和“愿意”的区别,就找到了二者对立的语义特征。

男的:你想跟我结婚吗?

女的:想。

男的:说真的,我并不要和你结婚。

用“想”上面的对话成立,用“愿意”上面的对话就不成立了。

男的: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女的:愿意。

男的:*说真的,我并不愿意和你结婚。

男的用“说真的,我并不要跟你结婚。”接话时,说明男的不想跟女的结婚,只是要确认一下对方的意愿,这时只能用“想”发问,不能用“愿意”发问。

这说明男的用“愿意”发问时，必须有“我想跟你结婚”的预设存在，而用“想”发问时，这种预设可有可无。

正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用例，我们才发现了“想”和“愿意”的区别在于“想”表示主动自发的意愿，“愿意”表示回应选择的意愿。

Ⅲ 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把意义上的问题和发话人认知上的问题区别开来

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解释可以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人们客观的反映外部世界的存在，另一个层次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存在加以主观的解释。后者就是认知语言学所要揭示的内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出现就使语言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不仅限于语言在篇章上的功能，而是更进一步从人的认知能力出发对语言现象加以解释。这样就使一些原来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得到了解释。

在对“想”和“愿意”进行对比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愿意”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用“想”替换。如：

丈夫能理财，我想移交经济大权让丈夫当外交大臣。男子汉十足的儿子说男人不应该以家务俗事为主，不愿意（想）让爸爸管。（北京晚报）

如果只停留在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就会认为是由二者意义的相同点形成的，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认知上的一个前景和背景的问题。有时一种意愿由于说话人的观察角度不同，可以作为回应选择的意愿来处理，也可以作为主动自发的意愿来处理。如果作为回应选择的意愿来处理就用“愿意”，如果作为主动自发的意愿来处理就用“想”。

此外我们还应用“家族相似性”，“象似性”等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想”“要”“愿意”“肯”作为意愿下位范畴的相互关系作了更高层次的解释。

Ⅳ 运用话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助动词在交际活动中语用效果

笔者在对“想”和“要”进行对比时还发现：

在语义平面上，“想”和“要”有意义交叉部分，所以在下列情况下，似乎既可以用“想”，也可以用“要”。如：

别提啦，我早就想（要）买件大衣了，看来去都是些看不上眼的。（陆文夫《清高》）

我姐姐说她还要（想）学点东西，大干一场。（北京晚报）

但是同属于语义交叉部分，以下两句“想”和“要”又不能随意换用了，尤其是不能把“想”换成“要”。如：

老师，我想去拜访您，可以吗？

李红，今晚我要去你那儿玩儿，可以吗？

前者和后者都是自己的意愿要得到对方的认可才能实现，先表达自己的意愿，然后征求对方的意见，然而，前者用“想”语气缓和，用“要”就有强加对方的感觉；后者用“要”就没有任何问题。其原因不是出在二者的语义本身，而是因为交际对象的不同，前者的交际对

象是老师；后者的交际对象是好朋友李红。

这种不同就是在话语平面上出现的现象。沈开木（1996，p87-94）认为表示“人与人往来接触的”大概念“交际”中，包括两个小概念：作为小概念的交际和交往。

“作为小概念的交际，是传递各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和一定的感情信息的交际。”

“交往，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交际。”

所谓小概念的“交际”和大概概念的“交际”的不同就在于包不包括交往。实际上是说有些交际可以不包含交往，单纯传递各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和一定的感情信息，如“想”和“要”可以互换的用例就属于这种交际内容；有些交际包含着交往，不只是单纯传递各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和一定的感情信息，同时要处理人际关系，如：上面“想”和“要”不能随意互换的用例就属于这种交际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说“想”和“要”的语义交叉部分，在话语交际平面上表现为两种情况：当交际中不包含交往时，语用和语义表现出一致性，二者的区别接近于零，所以可以互换；当交际中包含交往时，语用和语义表现出不一致性，“想”和“要”区别特征又开始起作用，需要客气时用“想”，不需要客气时用“要”。因此，发话人在发话时要按照和听话人的关系决定选择“想”还是“要”，“想”和“要”的选择直接影响交际效果，说话人只有做正确的选择才能处理好与听话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必须在话语交际的层次，研究助动词在交际效果方面的问题。

文 献

- 1980年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1981年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2年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2年 程美珍《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年 胡裕树等编《动词研究综述》的〈助动词研究综述〉一节。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年 山梨正明『認知文法論』 ひつじ書房
1996年 河上馨作『認知言語学の基礎』研究社出版
1996年 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年 沈开木《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相原 茂『謎解き中国語文法』講談社現代新書
1998年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袁毓林《计算语言和认知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82年 张维耿〈助动词“想”和“要”的区别〉《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1期
1983年 江天〈论“能”“愿”等词的属性及功能〉《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2期
1983年 蒋平〈“要”与“想”及其复合形式、连用现象〉《语文研究》1983年2期
1989年 周小兵〈“会”和“能”及其在句中的换用〉《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4期
1991年 傅雨贤、周小兵〈口语中的助动词〉《语法研究和探索》（五）中国语文杂志社
1991年 郭志良〈表示存在可能性的“能”和“可以”〉《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2年 许和平〈试论“会”的语义与句法特征〉《汉语研究》第三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 1993年 陶炼〈现代汉语助动词对比研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93年7月
- 1994年 史有为〈得说“不能来上课了”〉《汉语学习》1994年5期
- 1996年 孙德金〈汉语助动词的范围〉《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6年 讚井 唯允「助動詞（能、会、可以）」『中国語』（日本）1996年10期
- 1996年 熊文〈汉语“能”类助动词和英语can类情态动词的对比〉《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1997年 陶炼〈表示“或然性”的助动词“可能”“会”“能”之差异研究〉《汉语论丛》（一）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学研究室
- 1997年 鲁晓琨〈能愿动词“要”的语义探讨〉日本 文京女子大学研究论集々7卷1号
- 1998年 相原茂〈汉语助动词的否定形式〉98现代汉语语法国际学术会议于北京大学
- 1998年 渡边丽玲〈助动词“能”与“会”的句法语义分析〉同上
- 1999年 渡边丽玲〈助动词“可以”与“能”的用法比较分析〉第6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 于 德国汉诺威1999年8月
- 1999年 熊文〈论助动词的解释成分〉同上
- 1999年 鲁晓琨〈现代汉语意愿助动词的语义对比〉同上
- 1999年 铃木基子〈大学汉语选择题考试数据的电脑分析〉同上

注释

- (1) 参见鲁晓琨(1999)
- (2) 转引自熊文(1996)
- (3) 熊文(1996)谈到对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汉语的助动词也属于“困难层次模式”中最难的一个层次。
- (4) 转引自孙德金(1996)